

阶层分化与执政党维稳能力建设

陈家喜, 黄文龙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 我国阶层分化是改革以来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推动下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一分化展现在多个维度: 社会结构的分化、裂变与重构现象交错; 经济分层、社会分层与政治分层并存; 阶层分化、利益分化与观念分化凸显。社会阶层急剧分化也对执政党维稳能力提出挑战。提升党的维稳能力需要重构党的群众观念, 强化对分化利益的整合, 扩大对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体制化能力, 加强社会管理能力以及构建韧性社会安全网。

关键词: 阶层分化; 相对剥夺; 执政党; 维护稳定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8594(2012)03- 0130- 05

社会结构与政党执政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任何政党都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之下运行的, 社会结构形成政党活动的外部环境。社会阶层构成变化特别是主要阶层的变动, 会带来政党社会基础和支持力量的变化, 进而要求政党调整其制度、纲领和政策。而社会阶层利益结构和参与意愿的变动, 也会对政党政治动员和体制化能力提出新的要求。政党必须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进行自我调适, 方能持续保持生机和活力。

本文着重探讨改革以来社会阶层结构变动对于执政党维护社会稳定能力的关系。文章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变动的主要趋势, 着重探讨了社会阶层变化对于社会稳定形成的影响因素, 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执政党社会管理能力的具体策略。

一、改革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基本趋势

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是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推动下的社会变迁过程。改革初期, 我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是由“两阶级一阶层”构成的简化结构,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主体成分。改革以来, 我国社会分化展现在多个维度, 体现为社会结构的分化、裂变与重构现象交错; 经济分层、社会分层与政治分层日趋显现; 阶层分化、利益分化与观念分化现象并存。

(一) 内部分化与外部重组并存

1978年以来, 随着经济改革深入推进, 多种经济成分出现, 户籍制度与单位体制开始松动, 社会结构的分化、裂变与重构现象日趋明显。一方面, 原先社会阶层内部剧烈分化裂变, 形成各种子群体。原先以集体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农民阶层, 分化衍生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农村管理者、贫困农民等各种子群体。而工人阶层也分化为企业管理层、产业工人、失业群体等子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出现裂变, 出现专业型、公务员型、经理型、业主型、中介型、自由职业型等具体类型。^[1] 各社会阶层的内部分化也同时导致各阶层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和复杂化。

另一方面, 原有社会阶层在外部出现重组, 形成新的社会阶层, 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这些社会新阶层从传统社会阶级阶层中演化而来, 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当中。据统计, 截至2010年底, 全国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登记数量超过了4200万户, 从业人员总数约1.5亿人, GDP的贡献率达到了60%, 税收贡献率达到了50%。他们拥有较多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 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日趋重要的影响。

(二) 结构分化与地位消长并存

收稿日期: 2012- 01- 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政治安排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影响研究(07JC810009)、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 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研究(08JDXM81001)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家喜(1976), 男, 安徽怀远人, 副教授、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研究人员, 从事政党政治与阶层政治研究; 黄文龙(1986), 男, 广东河源人, 硕士研究生, 从事阶层政治研究。

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动不仅体现为阶层结构的分化现象,还体现为各阶层经济政治地位的升降变化。改革前,各社会阶层位序主要取决于政治标准,家庭出身、社会成分和政治面貌。工人和农民作为党的阶级基础和主要依靠力量,分别被赋予/工人老大哥和/农民兄弟0的政治地位,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改革以来,经济标准逐渐取代政治标准成为社会地位划分的主要指标,导致社会阶层位序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促使人力、智力、资本、关系网络等要素共同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从而使社会各阶层的经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工人和农民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参与社会财富分配所得有限,阶层位序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中华全国总工会一项调查显示,84.3%的职工对个人收入水平/很不满意0或/不太满意0^[2]。同时,由于自然灾害、粮食购销体制、土地征用拆迁等因素,农民在增收上十分乏力,也逐步沦为社会弱势群体。

私营企业主、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借助于资本和智力资源,在新的分配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并且,经济分层也带动了政治上的分化,经济优势一定程度有助于提升一个社会阶层政治分层的优势,这一点在新富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身上体现最为显著。调研显示,从1993年到2008年,担任各级人大代表的私营企业主的比例从10.3%上升到21.6%,其中地级市以上人大代表的比例从21.5%上升到81.6%;担任各级政协的比例从22.0%升至29.7%,其中地级市以上的政协委员的比例从81.7%上升至111.5%^[3]。

(三) 阶层分化与流动固化并存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还呈现阶层分化与固化并存的局面。一方面,社会各横向分化不断增加。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社会成员横向流动日趋频繁。社会成员源源不断地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从落后向先进地区流动,以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据统计,2010年全国农民工数量已达2.42亿,占农村人口的35.9%;农民工横向频繁流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农村空了、城市满了,城乡结合部乱了0的局面。

但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结构的纵向流动一定程度上出现梗阻。由于社会阶层间经济收入不断拉大,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并未完全消除,导致城乡低收入群体在职业选择、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进而影响到其向上流动的可能机会。调查显示,在/985工程0大学里,非农户口的子弟相当于农业户口子弟的21.7倍,/211工程0大学里是11.3倍。在保送大学的机会上,私人业主、管理阶层、专业技术阶层的子弟分别是农民子弟的7.6倍、81.5倍和10倍^[4]。

(四) 现实分化与心理分化并存

在经济分化和政治分化的带动之下,当前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一定程度的强弱分化现象。从强势群体的分布来看,那些掌握较多经济资源的阶层(私营企业主),掌握较多文化资源的阶层(高级知识分子)和政治资源的阶层(党政官员),构成强势群体的主要成分。同时,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退伍复员军人、底层知识分子、拆迁居民等构成弱势群体的主体。并且,社会结构的强弱分化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强弱群体之间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方面的差距日趋显著。基于不同利益立场,弱势阶层通过/抱团0集体维权现象日趋凸显;而强势阶层寻求利益代言,干扰政策制定的现象也在不断增加。

社会强弱阶层的现实分化还投射到社会心理层面,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社会价值、阶层认同和归属感上出现泾渭分明的现象。一方面,/仇官仇富0心态开始滋生和蔓延。社会公众对于基层干部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涉黑涉恶、侵吞公共财产等行为,对于富豪的炫富耀富、为富不仁、欺凌弱者等行为普遍愤慨,使强弱阶层之间的心理鸿沟加大。另一方面,权贵/二代0的出现激化了强弱阶层间的价值冲突。当前媒体和网络上广为炒作的官二代、富二代、垄二代、权二代等现象及其引发的社会争议,以及穷二代、农二代、蚁族等称谓的出现,也表明社会强弱阶层之间的心理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社会阶层分化对执政党维稳能力形成的挑战

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是我国快速现代化的副产品,是经济成分多元化和利益结构复杂化的社会体现,是一个客观发展的历史过程。然而由于分化的急剧性、分层的扩大化和流动的梗阻化,可能造成社会政治不稳,进而对党的科学执政和稳定执政构成了严峻挑战。

(一) 利益冲突与维权行动频发,党的社会管理能力面临挑战

当前社会阶层分化的后果之一是社会各阶层的阶层意识日趋凸显,利益冲突和维权行动不断加剧。一是在农村,围绕征地拆迁、干部腐败、村级选举等因素,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出现冲突。特别是近年来,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与之伴随的重大工程建设、招商引资和园区开发等日趋增加,拆迁问题引发的农民阶层利益表达行为不断上升,占据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5]。典型案例包括2008年11月17日/甘肃陇南事件0,2010年7月14日/苏州通安事件0。这些事件的起因多是被拆迁人利益受损,补偿标准不合理,安置不得当,保障不到位。

二是在城市,围绕城市更新、物业管理、房屋质

量、环境污染等因素,不断爆发城市业主针对地产商、物业公司、地方政府等主体的维权冲突事件。近年来,住房商品化的快速发展和房价的不断攀升,房产损益也成为城市居民的核心利益所在,围绕房产纠纷而出现的业主维权现象在大中城市此起彼伏。较为典型的案例包括2004)2006年深圳/西部通道事件0、2008年厦门PX事件0、上海/磁悬浮建设事件0、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0等。这些事件起因大多源于开发商欺诈、物管公司不作为、地方公共工程形成环境污染等。维权业主采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包括堵路/散步0、集体上访等。

三是在工厂,围绕工资待遇、欠薪、工伤、社保、失业补偿等因素而出现劳资冲突不断加剧。这一矛盾在上世纪90年代主要集中在破产重组的国有企业,矛盾对立的双方是失业工人和国企之间。从2000年以来,这一矛盾主要集中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矛盾双方也转变为农民工与资方之间。统计显示,在制造业聚集的珠三角地区,因利益受侵害而参与维权的民工数量,从2001年的16万多人次增加到2005年的25万人次。近年来,农民工维权形式开始出现从个体性/以死抗争0向集体性维权抗争方式转变,从非暴力向暴力转变^[6]。

此外,一些特定行业利益受损也出现维权行为。如由于油价上涨、行业竞争、非法营运、租金过高等因素而导致收入下降,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频繁出现,包括2005年山西临汾出租车司机罢工,2007年12月,宁波司机游行,2008年11月,重庆、海南三亚、山东青岛、广东汕头等地司机罢运等。群体性事件的集中爆发,展现了当前社会各阶层利益观念的觉醒和维权行动的自觉,也对党在维护社会和谐的能力提出了挑战。

(二)相对剥夺感与泄愤事件增加,党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侵蚀

社会心理的分化为泄愤事件的生成提供了土壤。如前所述,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贫富分化加快,社会流动不畅以及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导致社会群体中出现一定程度的“仇官仇富”心态和相对剥夺感,形成社会泄愤事件的心理基础。近年来社会泄愤事件不断发生,典型事件包括贵州瓮安事件与2004年的重庆万州事件、2005年的安徽池州事件、2006年的浙江瑞安事件、2007年的四川大竹事件、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等。与一般群体性事件相比,此类事件是一种“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事件,事件参与者大多来自素不相识的民众,没有利益牵涉和价值诉求,具有高度自发性和难控性的特点^[7]。

社会泄愤事件造成了党的执政合法性的严重流失。几乎所有社会泄愤事件的主要参与者都是无直接利益相关群体,而事件的结果却背离事件的起因。在谣言和暗示的鼓动下群体行为趋于情绪化,事件

矛头指向地方政府或执法部门,出现大规模的群体集聚,出现打、砸、抢、烧,冲击地方政府等暴力行为^[8]。并且,由于社会泄愤事件往往都会借助网络和通讯手段而扩散,导致社会公众对事件的强烈关注,由此形成对政府形象的污损,严重侵蚀了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合法性。

(三)体制外政治表达活跃,党的政治整合能力出现弱化

伴随信息化浪潮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特别是新社会阶层(不包括私营企业主)参与的主要方式。新社会阶层的部分群体具有体制外、年轻化、高学历的社会特性,更易于借助网络进行政治表达。统计显示,常在网上发表言论的网民,35岁以下的占78.8%,大专以上学历的占79.2%,在企业工作的占36.9%^[9]。许多公共事件如上海静安大火事件0/浙江乐清钱云会案0/温州高铁事故0等发生后,可以在网上看到新社会阶层发表的观点和看法。主要门户网站,如新浪、网易、搜狐,主要论坛如天涯社区、凯迪社区、强国论坛、新浪论坛、中华论坛,以及一些社交工具如微博、QQ等,成为他们政治活动的平台和空间。

然而,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和政治活动空间,网络表达的兴起对执政党的整合能力提出了挑战。网络参与的政治化表明新社会阶层政治表达意愿强烈和现实政治参与机会狭窄的紧张关系。同时,由于党委政府缺乏与网民在线有效引导和良性沟通,网络表达容易走向偏激。网上意见往往呈现两极化,极端地赞同或者极端地反对,导致“网络暴力”和“集体无宽容”现象。网络舆情与事实之间也常常有偏差,网民常常难以分辨新闻事实与传言甚至谣言,网上“意见领袖”左右网民的观点立场和价值判断。

(四)代际流动固化与阶层对立,党的社会整合能力下降

新生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出现梗阻引发阶层固化的社会争议。一方面,强势二代阶层斗富、摆阔、飙车、斗殴等现象屡有发生。从2010年杭州飙车案出现“我爸是李刚”一语后,“我爸是局长”、“我爸是县长”、“我爸是所长”、“我爸是国法”等“官二代”现象频繁被媒体曝光,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谴责。一些权力部门出现“萝卜招考”,为干部子女量身定做报考条件;一些垄断行业如电力、烟草、邮政等,具有较高的垄断利润和良好的职业保障,部分延续子承父业或行业内招聘的“接班”制度。上述现象显示了可能导致“阶层固化”和“精英复制”的后果。

阶层流动固化对于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提出了挑战。正常的社会代际更替和精英循环流动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如果代际更替导致纵向社会流动梗阻,贫富分化和强弱分化进一步延续到下一代,社会精

英上下流动渠道不畅,形成严重的/社会断裂0和阶层对立的局面,并可能导致政权寡头化或民粹化。尽管与其他群体性事件,如民工维权、业主抗争以及泄愤事件相比,/官二代0/富二代0和/垄二代0事件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并不大,但是对社会舆论和价值观的毒化却十分深远。如何弥合干群之间、贫富之间、强弱之间的心理对立,是对执政党社会整合能力的一大考验。

三、提升执政党促进社会和谐能力的策略选择

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构导致社会结构关系的紧张和社会矛盾的增加,从而影响到党和政府所维护的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分化社会背景下,执政党更需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0^[10]。

(一) 重构执政党的群众观念

社会阶层结构、利益结构与观念结构的变化,需要执政党调整原有的群众观念。党的传统群众观把人民群众视为整体利益一致的群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作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相互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并且,在计划体制、单位制、公社制和户籍制的各种体制安排下,他们被制度化地限定在不同的利益单元,相互间发生利益冲突的几率较少。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构,多元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这一观念必须加以更新。要正视人民群众利益分化的现实,人民群众不再是利益完全一致的统一体,而是由每一个具体鲜明利益诉求的阶层和群体所构成,他们利益诉求既有相同或者交叠之处,但也有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围绕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资关系、物业纠纷、环境污染等事件而引发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增加,甚至会常态化地存在下去。

党要尊重和保护每一个社会阶层合理正当的权益。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以及/两个先锋队0的属性定位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执政党更应明确保障每一个社会阶层的正当权益,重点关注工人、农民和农民工等弱势阶层的利益诉求,包括保障工人在医疗、住房、养老、工资和就业等方面的权益,农民在征地拆迁、村级财务、基层民主等方面的诉求,以及农民工在劳资纠纷、子女教育、社会保障、职业培训上的市民化待遇。同时,执政党还需保障私营企业主的财产权利,避免/仇富0情绪的蔓延进而出现阶层间的对立。

(二) 强化对分化利益的有效整合

改革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利益结构的分化。而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加剧,核心也是各阶层基于不同利益立场之间的冲突。执政党提

升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首要的是协调和处理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一方面,提高政策制定的针对性,构建多元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在承认群众利益多元性的前提下,执政党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全面考察政策可能对社会各阶层所造成的利益损益情况,要对各种利益诉求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执政党需要慎重地处理个体与群体、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对多元复杂利益的协调统筹能力;尽可能避免以/全局利益0或者/整体利益0而牺牲部分社会成员的合法正当权益,在不可避免情况下也应当对后者给予相应的利益补偿。

另一方面,提高政策制定的开放性,构建多元社会利益的协商机制。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开放性和民主性,提升对分化利益诉求的凝聚和提炼,是解决利益矛盾的有效方式。当前,执政党要防范由某一个群体或者少数阶层主导政策制定的局面,特别是强势阶层对公共政策的扭曲和干扰。在税收政策、住房政策、教育政策、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救济等与每一个阶层利益都息息相关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执政党要做到问计于民、问策于民,充分运用人大和政协调研、专家听证、网络意见征集以及公民个人建言等形式,广泛征询社会各阶层对政策的诉求和建议,形成有效的利益聚合机制,最终决策满足大多数社会阶层的利益。

(三) 促进社会各阶层的有序表达

经济的发展常常带来利益表达行为的增加以及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升。拓展各阶层政治参与的渠道,增强体制性政治吸纳能力,是执政党面临的重要任务。首先,积极推动社会各阶层有序政治参与。要适应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趋势推动人大、政协的改革。改变各级人大、政协中党政官员、私营企业主、演艺明星比例过高现象,不断扩充各类新社会阶层的代表委员比例,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白领阶层、社会中介绍从业者等,优化代表委员的结构比例。加强党务公开和政务信息公开,扩大社会公众的知情范围,解决公民与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断完善选举、信访、听证、决策咨询、信息公开、人民陪审员等制度建设,畅通群众利益表达的具体机制和渠道。

其次,促进社会阶层的组织化表达。充分发掘现有的制度体系,包括人大制度、政协制度、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在聚合和传递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上的政治功能。通过设立人大代表联络站,领导干部大接访,开展党代表进社区等活动,确保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渠道得以畅通。培育和扶持民间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发挥其在聚合阶层诉求,表达阶层利益的积极功能。建构网络表达的制度渠道,通过设立网络问政平台,探索在线搜集网络民意、在线回复网民

提问、在线咨询网络民意等具体机制,积极开展网络民意调查,及时搜集和回复那些民众强烈关注的问题;重视开展政府与民众的网络沟通交流,提升政府网站与网络民意的互动效率。

(四) 构建弹性韧性的维稳体制

实现从僵化稳定观向弹性稳定观转变。在正视社会矛盾常态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上,避免受静态僵化的维稳思维主导,如过分强调/ 稳定压倒一切0、/ 严防死守0、/ 消灭在萌芽状态0等^[11]。在上述思维主导下,地方党委政府简单粗暴处置社会矛盾,最终进一步激化矛盾。弹性稳定观要求地方党委政府在处置社会阶层间的利益矛盾,如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环境污染等,作为中立公正的裁决者站在冲突双方之上,通过引导、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理性方式,疏导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行为。

实现政治性维稳向法治化维稳转变。传统的维稳工作被视为一种/ 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0,出现/ 体制性防卫0 过当的现象。^[11]其主要表现为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在解决社会矛盾时,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造成严重的警民对立和干群对立,最终使政府的公信力严重流失。应当确立法律权威,把维稳工作最终引导到法治化和制度化的框架内化解。针对当前诸多的社会利益冲突,首先坚持利益疏导和协商的路径,在无效的情况下再诉诸司法机关。各级司法部门应当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调解争端、化解矛盾。

(五) 提升党的社会管理能力

社会管理能力是衡量一个政党执政水平的重要指标。现代政党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民生福利的改善程度是政党能否赢得社会各阶层政治支持的关键问题,也是缓解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副产品,我国贫富差距扩大与强弱分层在一定时间内难以消除。执政党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弥合社会阶层之间的裂痕,缓解社会不满情绪。首先,健全社会保障,改善民生福利是社会结构的稳定器。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不同阶层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能为广大社会成员特别是低收入者提供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保障,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而且也有利于改善群体间的关系,缓和群体矛盾,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 减震器0 和/ 安全阀0 双重作用。

其次,重点关注城乡弱势群体,构建多渠道的扶贫帮困机制。对失业群体、农民工群体、因灾致贫群体等困难群众,应当在就业安置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优先考虑和适当照顾。重点关照由于企业改制、集

资、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移民、复转军人安置、离退休人员待遇、环境污染等因素致贫的群体,要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2]。要建立多渠道的关爱弱势群体的机制和渠道,通过单位、社区、劳动中介组织和个人等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开展扶贫帮困活动,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对一些弱势群体,在平时给予物质帮助的同时,要及时做好思想工作,尽力消除由于经济上的差异而带来的不平衡心理。

最后,妥善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促进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比较政治研究显示,社会精英与大众之间泾渭分明,相互误解和敌视,容易导致寡头政体或民粹主义抬头,造成社会政治的不稳。应当采取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等办法,适度调节各阶层的收入差距。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扭转新兴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让社会各阶层都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分享到利益,避免绝对利益受损和相对利益受损群体的出现。

参考文献:

- [1] 张素云,李晓燕. 30年来中国阶层结构变迁中的社会稳定问题研究[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9, (1).
- [2] 中华全国总工会宣教部课题组. 当前企业职工思想现状和思想政治工作调查[J]. 政工研究动态, 2007, (3).
- [3]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 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摘要[N]. 中华工商时报, 2009 - 03 - 26.
- [4] 辛鸣,杨继绳,等. 防止/ 阶层固化0 促进社会流动[J]. 时事报告, 2011, (11).
- [5] 王红茹. 土地纠纷急催征地制度改革[J]. 中国经济周刊, 2006, (9).
- [6] 吴桐. 新生代农民工十大最新动态[J]. 半月谈, 2011, (14).
- [7] 于建嵘. 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8, (1).
- [8] 于建嵘. 社会泄愤事件中群体心理研究[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9, (1).
- [9] 汝信,等. 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296.
- [10] 胡锦涛.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N]. 人民日报, 2011- 02 - 20.
- [11]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 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J]. 领导者, 2010, (4).
- [12] 李培林. 加强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和治理[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 02 - 09.

1 责任编辑:陈景云2